

## 「麻風爲業」的當代中國式汙名與韌性 Careering Along with Leprosy: Chinese Leprosy Doctors' Stigma and Their Resilience

孫賀\*\*

He SUN

新冠肺炎陰霾籠罩全球的前夕，作爲疫情首發地的中國大陸，「中國式」的防疫舉措可謂毀譽參半：從透過小道消息聽聞某地出現傳染病肺炎疫情，到官方層面的「闢謠」、「吹哨人」被訓誡、享有高聲譽的院士級專家公開披露疫情，到一座千萬級人口城市的全面「封城」、舉國動員機制下各地醫療工作者赴漢支援，再到防疫超越GDP成爲地方政府當下更重要的績效考核指標。

短短數月間，幾乎所有國人都被捲入了這場舉國防疫運動中。其中太多所聽、所見與所聞，都不由得讓筆者想起了曾於去年讀過的一部著作——《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劉紹華2018），遂決定從書架重拾再次閱讀。

此書爲臺灣人類學家劉紹華老師的一部跨越時代的力作，其田野跨度超過十年，整個敘述軸線、更是跨越了數十年的共和國歷史進程。相比其他的麻風研究專著，本書將研究對象聚焦在了一個原來較少受到關注的群體——麻風醫生。

---

投稿日期：2019年08月15日。接受刊登日期：2020年07月07日。

\*\* 孫賀，廣州中山大學政治學學士，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碩士，主要研究興趣爲現當代中國史、東亞及東南亞都市空間與景觀塑造機制、都市住房文化、中國東北移民群體流動性等等，近期研究包括期刊發表〈歷史景觀的差序化記憶：都市工業記憶治理中的公正性問題初探〉，碩士論文《鋼鐵工業地景「文本再現」與「知覺記憶」的張力關係——北京首鋼爲案例》等。

電子信箱：nctusunhe@gmail.com。

「麻風」(leprosy)，這個如幽靈般糾纏著人類數千年的古老頑疾，雖然其傳染性較弱、發病進程慢、幾乎不會致死，但因其會令感染者容貌損毀、肢體殘障，自古以來便被賦予了「令人恐懼」、「不可接觸」等極端負面的文化隱喻。

1950年代到1980年代初，中國大陸政府於短短三十餘年的時間，便在國家尚且貧困、疆土面積廣闊的窘迫境遇之下，讓困擾了這個「文明古國」三千年之久的恐怖傳染病發病率大大降低，其成就可謂舉世矚目，而作為此防疫運動下的執行者——麻風醫生可謂功不可沒。

但透過對諸位人生際遇各有不同的麻風醫生的生命歷程史書寫，可知取得這一輝煌成就背後的另一面：麻風醫生們所承受的並非僅僅是工作上的辛勞，還處於多種形式的「汙名」下「被邊緣」與「被歧視」的命運共同體鏈環中，更是打開了本書最富魅力的思考張力。

## 一、多重汙名：麻風汙名的紅色中國式展演

### (一) 意識形態掛帥下的麻風汙名

1950年代以降，當冷戰揭開序幕，意識形態與長官意志開始凌駕專業主義，中國大陸為盡快消除麻風所帶來的國際負面印象；同時為保證集體化的順利開展，在應對麻風這種原本傳染性不強的疾病時，原本在同時期、國際上已出現的關於關注麻風患者人權、拆除麻風聚落等的舉措，在中國國內未能得到有效的重視，而是依舊以「科學」之名，繼續施之以過度的防疫舉措（如廣建麻風聚落、隔離手段的濫用等等），這非但未能減輕，反而更加劇了大眾對麻風的汙名想像。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這種「汙名」並未僅作用於外部世界。對於麻風醫生們而言，因理念和派別的不同，在醫學院教學或是臨床實習中、所習得的一些「全副武裝」式的防護手段，可能更會令麻風醫生們將麻風背後的恐怖隱喻進一步地被內化。

當來自外部和自身的汙名均處於其中，並受到了政治因素的阻隔，來自國際上關於麻風汙名化而無法得到有效消解的批判性思考，未能在當時的國內形成有力的話語聲量。被「政治化」了的科學主義亦無法得以有效地化解汙名，反而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那麼「雙向汙名」似乎就非常自然地「水到渠成」了。

## （二）階級出身差異下的麻風汙名

除了因疾病及其防治政策本身帶來的汙名化隱喻外，社會主義中國的一種階級劃分形式，也間接地成為職業分配的考量因素。在「地富反壞右」或「海外關係」等分類體系下，擁有被視為出身不好的「家庭背景」，對醫學生們而言，反而是更可能被分配從事麻風防治工作的主要因素。

因「不好」的政治出身，而被分配一份在醫師界看來是「不好」的工作，成為了書中提到的諸如胡鷺芳、鄔佩璋等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們「被以麻風為業」的階級原罪。雖然「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唯一的志願」等口號，成為醫學生被委以任何性質工作的合理性依據。但為何多位受訪的麻風醫生的階級出身皆「不紅不專」？這似乎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所謂毛澤東所言「在社會主義的國度，革命工作只是分工不同，無高低貴賤之分」的偽善性。

即便是在醫療體系內部，出身不好則意味著更容易被分配到此體系之下如麻風防治等地位較低的工作。此外，正也是因為它原本的被汙名、邊緣與歧視，在這套「社會主義式平等」的話語粉飾下，職業分配體系的政治出身差與職業地位低的高度耦合，構成了一個互為因果、交互遞進的惡性循環圈，麻風汙名更是滲透進麻風醫生們的命運軌跡之中。

## （三）特殊時期麻風汙名的幸之不幸

有關麻風的「汙名」雖一直延續，但在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時期（1966-1976），「汙名」反倒成為了一些麻風醫生們「塞翁失馬」般的人生幸事。

本書的第五章，描述諸多類似的歷史細節，令筆者感到頗為意外：例如在文革期間，麻風防治相關的期刊未曾停止；被下放的醫生免去大量政

治參與的時間耗費，可更專心地投入到相關的學習和研究中；麻風村內的生產和生活較少受到「紅衛兵」的衝擊等等。

這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依筆者之見，並非是一種真正的幸事，反而構成了一種汙名結構下的歷史反諷。其實汙名未曾改變，恰是這種因汙名而被邊緣的「歧視」與「被歧視」的身份結構處境，才築成了一道遠離文革血雨腥風式鬥爭漩渦的無形閘口。這既反證了文革本身的荒謬之處，又透過「汙名」之幸，將一種源自真實，但卻猶如戲劇般演繹的「以麻風為業」的人生經歷之悲展現得淋漓盡致。

當新中國的執政黨，以意識形態掛帥和政治意志主導下的所謂「科學主義」，深度滲透麻風防治的實踐過程，麻風醫生的「汙名」可謂由外及裡地貫穿於大眾、醫療體系內部乃至麻風醫生們本人對麻風的偏見之中，於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如影隨形般地伴隨著他們走過大半程的人生旅途。

## 二、何以堅守：「麻風汙名」的「主體韌性」之感

### （一）汙名之下的主體韌性

當汙名一直伴隨著多數麻風醫生們職業生涯的始終，劉紹華在書中的疑惑，似乎能拉伸出另一重更為複雜的討論張力：他們的生命歷經艱難與磨難，是怎樣的動力可以「支撐他們至今依舊品性良善，堅守理念、談笑風生」？

雖然，書中並沒有專門的章節對此進行討論，但筆者在讀過全篇文章之後，認為這首先可能與麻風醫生們各自的個人性格、機會際遇有著幾分的相關性。例如於川醫畢業、出身不好的胡鷺芳醫師，面對著來自他者的歧視，一種對自身命運不屈、不從、不撓的性格，成就了其在工作中的卓越表現；又如出身同樣不佳、醫專畢業的江澄醫師，雖非受科班醫學院的專業訓練，但在進入蘇北的麻風村從事基層防治的過程中，猶如找到了一份可以安身立命的天職，辛勤工作，借機遇調回了位於家鄉南京的中央皮

研所，亦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業。

當然，除了有個體差異的因素存在，對於其中存在的某種相似性，依舊值得我們去思考，這是否與當代中國在社會主義時代所建構的醫學職業倫理觀存在關聯？1950年代以降，《人民日報》等國家主流官方媒體中，醫學職業倫理中所強調的「醫學是為人民服務的」，對象不僅僅侷限於患者，而是要為全體人民的健康負責。對於醫德和工作內容／狀況的報導，除文化大革命外，以醫院的專業醫生為主體的報導始終占據主要版面，醫德一直為其最主要的報導內容（姚澤麟、寇靜媛2018: 70-80）。

醫德的塑造，對於身處那個時代的麻風醫生們而言，在接受醫學教育和訓練之時，多大程度上受到這種作為醫師的職業倫理感召並將其內化於心，是不得而知的。而在數十年之後，也無法完整地去重現當時最真實的心理感受了。

但書中曾提到的一個細節，似乎可以給予我們一定的推測空間：幾位老麻風專家們，對本書的觀點和看法似乎未能全部認同。而這種不認同，不知是否與這些麻風醫生們所受到這套職業倫理文宣的作用或是耳濡目染的熏陶有關？認為「以麻風為業」即是在踐行「為人民服務」的職業宗旨，因而並未過度地看重自身在職業生涯中所遭遇的「汙名」及與之相隨的「情緒勞動」。這成為了筆者在閱讀此書過後，心中最大的疑問。

## （二）主體韌性的淒美之詭

若是與同時期的其他群體做類比，麻風醫生所經驗的主體韌性，在同時期的其他青年群體中，因其不同的政治出身所展現出來的微妙差異，也透過文學作品的敘事進行了表達。

知青文學代表作家梁曉聲所著的小說《今夜有暴風雪》（2016）中，一位出身右派家庭的上海女知青裴曉雲，雖心中飽含革命理想，但在其插隊的生產建設兵團，<sup>1</sup>多年來一直備受出身紅五類家庭的女排長的排擠和冷

---

1 編註：插隊，安插於農村生產隊伍，通常指1980年之前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方式。

airiti

落。直到文革後知青集體請願返城的暴風雪之夜，首次被排長委以獨自站崗戍邊的重任，但其卻並未安排其他人接手崗位，而裴曉雲仍依然執著地等待接班者，最終悲劇般地在這個暴風雪的夜晚被凍死，從而永遠地留駐在這片異鄉的土地上。

小說中故事情節的設置，確是富有象徵的反諷意味。當出身紅五類家庭出身的共產革命既得利益者身兼排長一職，表面向「左」積極、實則「精緻利己」，<sup>2</sup>利用著自己權勢和地位，排擠與冷落出身右派家庭的女知青。而右派的女知青，思想和行動上一直追求進步，但卻一直未被真正地賦予實踐革命理想的機會，又是在一個知青支邊報效祖國之理想集體幻滅、黨遭遇不信任危機的時刻，爲執行排長分配的一個沒有接班者的站崗任務，最終永遠地葬送在了遠離故土的祖國邊陲之地。

階級出身的差異左右著這些社會主義時代青年們的命運。在社會主義革命理想話語形塑之下，出身優勢者的功利運用與出身劣勢者的執著服從，最終鑄成了這齣十分弔詭的淒美悲劇。

### （三）麻風醫生的不幸之幸

小說中所塑造右派出身的知青，與書中所描繪的幾位麻風醫生有著幾分相似之處。因階級出身左右了命運，但卻有著一股不服氣和不服輸的精神。不過相比廣大知青而言，他們的命運際遇，已算是不幸中的幸事了。

這些知青們，社會主義革命理想幻滅而返城後，多數面對的生活及人生際遇，亦是十分艱難的。居住空間逼仄、長期待業、單位下崗再就業等一個接一個的人生苦難在等待著他們。而插隊期間在務農等方面所掌握的技能，卻也無法有效地銜接返城後的工作。青春時代爲了祖國的無私奉獻，卻也因中年後的不濟人生，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下，純粹得不由得令

---

2 精緻利己，取義爲「精緻的利己主義」，此說法源自錢理群教授在2012年、由前武漢大學校長劉道玉先生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發表的一段談話，後被中國大陸各界所廣泛熱議：「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人唏噓感嘆了。

對於身處文革時代的麻風醫生們而言，不論是正規醫科畢業抑或是接受過短期麻風班的培訓，終究還是接受了相對專業的醫學訓練。習得的專業技能，在市場經濟時代倒還同樣適用。此外，正如前文所言，正是這種汙名、歧視與被邊緣的角色處境，倒也築成了一道躲避文革血雨腥風式鬥爭漩渦的無形屏障，為可能在這場暴風驟雨中遭受迫害的麻風醫生或病患們提供了一個絕佳的避風港，反而獲得了更多身體和精神上的自由。在這個相對特殊的歷史時期，創造了一個簡單、自由而又相對充實的研究和工作環境。而這種被逼而上的職業攀爬通路，又戲劇化地令少數非科班出身的麻風醫務工作者們躋身行業菁英。改革開放後，又邁向了自身事業的巔峰，成就了極少量的鳳毛麟角者，將「麻風」作為自我的終生志業。

因而在其晚年經歷了憶往昔的橫縱向對比後，這種麻風醫生的主體韌性似乎也未必會隨著時世的再次巨變而崩解。若說廣大知青、尤其是裴曉雲所代表的犧牲者們是時代之不幸，那麼同時代的麻風醫生姑且還算是不幸之幸了。

### 三、何以為人：從麻風防治反思新冠防疫

#### （一）中國式麻風與新冠防疫的政策邏輯

當麻風醫生們「汙名」下的生命史，在巨變中國的歷史脈絡下被書寫。原以為這一切已然成為過往，行將被掃入歷史的塵埃中，但此次令人頗感意外的新冠疫情，卻將他們生命史中可捕捉到的命運蹤影，又以一種重力加速度般的展演形式，高度濃縮式地再現於整個防疫過程中。

防疫措施在短短數天內，戲劇般地出現了「急轉彎」。從上而下的消極應對轉變為舉國上下的積極防疫。雖新冠肺炎為一種傳染強、發病急、可致死的新型疾病，其病理特徵與麻風迥然不同。麻風防治被塑造為一場長期的「持久戰」，防疫政策的執行期持續數年，但對醫生和病人的影響

卻是伴隨著終生；而新冠防治則可被視作一場危急時刻的「防禦戰」，在舉國動員的防疫機制下，除了對病人和醫護人員影響十分深刻外，幾乎所有國人都在此刻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

兩者看似外在情境全然不同，但其背後的內在邏輯卻是高度相似：數十年前的過往，當確診或疑似的麻風患者成為了某地實現集體化的可能性阻礙，出現了各地廣設麻風村、對麻風病人的過度隔離，以及書中提到由此引發的對麻風醫生們一系列汙名與歧視等問題。數十年後的當下，當疑似的新冠患者成為了某地實現零輸入或確診的不穩定因素，如全國對湖北、武漢人的「泛汙名化」、武漢因封城而導致其他慢性病患者無處醫治、被困在武漢的外地人露宿街頭、租客返城需房東擔保才被允許進入社區等等問題卻層出不窮。

當一個「為了人民」而設定的遠大理想，在大國復興的話語操縱之下，由一個僵化的科層制官僚體系，自上而下對政策目標進行逐級分解。在這一過程中，對「人民」的抽象式想像已完全脫離於一個具體的人，往往導致任何對個人的「犧牲」似乎都帶著合理的正當性。

## （二）當代語境下「醫者天職」的「韌性」之思

當我得知做護士的堂姐，於今年二月初主動請纓，成為援漢醫療隊的一員，赴漢支援了兩月有餘，筆者的心中不免泛起層層波瀾。觀察著家人們在微信群、朋友圈裡「勝利歸來」的加油打氣與「注意防護」的擔憂惦念，筆者除了鼓勁和擔憂之外，不免得會對堂姐的選擇感到好奇。堂姐醫專畢業後，一直以合同工的身份在公立醫院工作，沒有事業編制、薪資相對微薄，長期遭受著工作量相同、但薪資福利不及有事業編制的護士等不公待遇，為何依然會選擇主動報名？

當我問及關於當時志願赴武漢支援的初衷和感受之際，她表示：

當時（一月下旬），疫情爆發，全員被要求取消休假，醫護人員們一直喊著「若有戰、召必回、戰必勝」的口號，剛剛畢業時培養作為醫護人員的責任感，又被激發出來了，於是覺得心理有了一種很強的使命感，因而當時也沒多想，就報了名。起初覺得自己選不上，沒想到還選上了。雖然之後自己可以被參考編制人員



airiti

待遇，實現了同工同酬，但是當時（報名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這一問題[……]其實去的時候，還是非常害怕，就怕回不來，於是在走之前，連遺書都寫好了。但真正見到了新冠患者，就覺得不怕了。

而最令筆者所震撼的，是問到她為什麼害怕，還是選擇赴漢支援後，她有些令人出乎意料的答案：「我覺得（赴漢支援）就是一個責任，輪到我們醫護人員能做點事情的時候，我也就衝上去了，醫者天職吧」。或許，麻風醫生忍受「汙名人生」依然能保持強大的「主體韌性」，除了社會主義時代報效祖國的理想之外，也正是如堂姐們一般，縱使遭遇了制度體系下的不公，但在宗教、倫理、道德、職業、專業等的規訓之下，依舊能形塑為某種類似「醫者天職」的責任或使命感。

而這種韌性又為何？當作者的關懷，落在集體主義之名的社會主義疫病治理模式下的汙名和歧視，雖令防疫成效立竿見影，但卻忽視了人之所以為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尊重。似乎可窺見，這種對於「主體韌性」的磨礪，相較於知青等支邊、下鄉的群體，各有各之不幸，且縱觀其人生際遇已屬不幸之幸了，但置身於這樣一套被構造而出的意識形態、階級出身差異，不斷被鞏固的歧視與汙名結構之下，他們終究還是不幸的。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帶給筆者關於當下中國的最大思考，即是歌頌如「醫者天職」般的奉獻精神並非錯事。而國家和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執行，如何讓「人民更以為人」、「生命更以為命」，令醫者之仁不再被肆意辜負，應是我們進一步致力於思考和推動的方向。

## 引用書目

- 姚澤麟、寇靜媛 (Yao, Zelin and Kou, Jingyuan)。2018。〈國家治理視角下的醫生媒介形象變遷〉“Guojia zhili shijiao xia de yisheng meijie xingxiang bianqian” [The Change of Doctor’s Media Image by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 Governance: Based on Relevant Reports of People’s Daily from 1949 to 2014], 《社會科學》 *Shehui Kexue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12): 70-80。
- 梁曉聲 (Liang, Xiaosheng)。2016。《今夜有暴風雪》 *Jinye you baofengxue [A Storm Is Coming Tonight]*。北京市 (Beijing)：中國青年出版社 (China Youth Press)。
- 劉紹華 (Liu, Shao-Hua)。2018。《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Mafeng yisheng yu jubian zhongguo: houdiguo shiyan xia de jibing yinyu yu fangyi lishi [Leprosy Doctors in China’s Post-Imperial Experimentations: Metaphors of a Disease and Its Control]*。臺北 (Taipei)：衛城 (Acropolis)。